



未名社科·媒介与社会丛书（翻译版）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edia Establishment

美国传媒体制的兴衰



〔美〕达洛尔·M.韦斯特(Darrell M. West) 著 董立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edia Establishment

美国传媒体制的兴衰



〔美〕达洛尔·M.韦斯特(Darrell M. West) 著 董立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8-23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传媒体制的兴衰/(美)达洛尔·M. 韦斯特著;董立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

(未名社科·媒介与社会丛书)

ISBN 978-7-301-16516-4

I. 美… II. ①韦… ②董… III. 传播媒介—研究—美国 IV. G21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0988 号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under the titl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edia Establishment*, 1st edition by Darrell M. West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St. Martin's Press, LLC.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书 名: 美国传媒体制的兴衰

著作责任者: [美]达洛尔·M. 韦斯特 著 董立 译

责任编辑: 诸葛蔚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516-4/C·055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65016/62753121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1 印张 157 千字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前言

美国媒体的本质是当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现有的许多著作都探讨了记者如何报道新闻,进而影响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轨迹。对记者的工作,鞭笞者有之,畏惧者亦有之。然而很少有作者从历史的角度来展开这个话题,讨论新闻业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并从一系列的案例着手,得出自己的结论。本书正试图填补这方面的空白。通过直观的历史途径,本书将论述记者们是如何完成自身的工作,并对社会政治形成了何种影响。

一直以来,记者在美国就被认为是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中一股强大的力量。在二十世纪,记者具有很高的公共威信,对于新闻采写的垄断和报道的专业化,使记者作为(新闻)守门人而极大地影响了对于全国性事件的塑造。但是今天,时代已经不同:新媒体纷纷出现,电视观众逐步分化,人们对于记者的公正和客观性丧失了信心,报道变得更异质化了,报社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够主导大众的看法。事实上,通常所谓的“媒体”似乎已显得过时。到处都繁衍着各种新闻和娱乐,其专业化水准也参差不齐。

在本书中,作者记录了1789至2000年间美国媒体制度的兴衰。在美国历史的早期,媒体并不强大。早先年代的党派狂热和随后的商业小报作风给记者带来了相当负面的影响和很低的公信力。十九世纪的记者倾向于模仿政党领袖的观点,或是制作轰动性的犯罪和丑闻报道。他们基本上缺乏足够的可信度和独立性。

在二十世纪,随着专业化传媒的逐渐成型,记者一跃成为一股政治力量,以前所未有的力量主导了新闻的传播。由于媒体组织方式、新闻报道模式和公众对媒体感知的变化,记者成了主要的权力代言人(power-

er broker)。在大众眼里,记者成了社会上最受尊敬、最可信赖和最为公正的人。职业记者具有很高的公信力,并自视为公正新闻报道的唯一提供者,他们对全国性事件有着相当的影响力。

然而,在过去的十年间,媒体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有线电视、热线电台和互联网等各种新媒体的出现,媒体制度失去了对于新闻报道的控制力,各类媒体也陷入了白热化的竞争之中。在这个时期,新闻报道不再像往常那样同质化和专业化,而是更具有轰动性和小报化特点。正是由于这些变化,以及记者公众威信的下降,记者所具有的权力也受到了侵蚀。爱德华·R. 默罗(Edward R. Murrow)、瓦尔特·克伦凯特(Walter Cronkite)和大卫·布洛德(David Broder)所代表的辉煌时代已经让位于马特·德鲁齐(Matt Drudge)、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乔·雷诺(Jay Leno)的黄色笑话和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的午夜电视节目。

这些发展变化对于美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体系具有深远的影响。由于主流媒体力量的削弱,精英记者将不再能够统领公众对于全国性事件的反应。更为异质化的报道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维系美国人民的共同文化背景。定位于小众市场的窄播取代了大众化的广播。随后而来的电子巴尔干化(electronic Balkanization)进一步意味着公众对于时事的态度被细分为各个性别、种族、生活方式和地理类别。其结果就是媒体体系基本上不再吸引任何人。

在探讨我们是如何迈向目前这个历史阶段的过程中,本书将回顾媒体制度为什么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先后获得和丧失了控制力、这些媒体权力的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它们对于公共生活有什么影响,以及媒体行业的未来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通过一种历史的视角考察了二十多个从建国时期到今天的比较性案例之后,作者将阐明不同时期的记者是如何报道当时的事件,以及这样的报道对于美国国家的形成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在结尾处,本书还将指出,当前媒体体系的分裂状态并不总是坏事,它事实上能够对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起到防范作用,例如大公司对于新闻的控制,以及各种含有偏见的、肤浅的和不公平的报道

的泛滥。虽然从整体上讲,新闻行业的专业化有着显著的降低,但是单个媒体的缺陷也得到了多方面的平衡,如媒体的多样化、报道的异质性,以及特定频道的权力和受众份额的减少。就像托克维尔总结早期美国报业时一样,总体来说,多样化的媒体体系是安全的。

本书适用于多门课程:例如美国政治导论、大众传媒、政治运动和选举以及美国政治发展等。本书的重点在于通过可读性较强的案例研究,分析记者和编辑在美国历史的各个不同时期如何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从而说明媒体的作用,以及为什么今日的媒体失去了曾经的威信和影响力。

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作者得到了许多人士的帮助。阿莱克斯·斯洛斯比(Alex Slawsby)作为研究助理为本书做了长期的勤恳工作。他非常善于寻找许多相关引文的出处并确认有关的事实。同时,他也对本书的总体构架提出了一些有用的建议。

牛津大学努菲尔德学院(Nuffield College)的巴伦·夏福尔(Byron Shafer)尽管在当时并不知情,但却是他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最初的动力。1993年的假期,作者应其邀请前往牛津共同主持了一场学术研讨会。正是在此期间,作者所做的一次演讲为本书的后续写作定下了基本的框架。

在过去的几年里,作者在布朗大学开设政治运动和选举、大众传媒课程。修课的学生们在讨论本书研究的项目时,通过提出各种富有挑战性的提问,也为本书提供了不少帮助。学生们的激情也让作者意识到:本书所讨论的话题是值得书写的。

在此,向 Bedford/St. Martin's 出版社的前政治学编辑詹姆斯·海德利(James Headley)表示感谢,正是他的慧眼看中了本书的潜在价值。而他的继任者凯瑟琳·科斯曼(Katherine Kurzman)则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宝贵意见。当然,还有许多外部评论者对如何加强本书的论述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他们包括伊萨卡学院(Ithaca College)的马丁·L. 布朗斯坦(Martin L. Brown)、普罗维斯顿学院(Providence College)的詹姆斯·M. 卡尔森(James M. Carlson)、韦顿

学院(Wheaton College)的乔·S. 古德曼(Jay S. Goodman)、伊力诺依大学芝加哥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Chicago)的多瑞斯·格莱布(Doris Graber)、锡耶纳学院(Siena College)的马修·J. 林德斯特洛姆(Matthew J. Lindstrom)、俄勒冈州立大学(Oregon State University)的罗伯特·C. 萨尔(Robert C. Sahr)、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理查德·A. 史瓦思洛兹(Richard A. Schwarzlose)、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的迈克尔·C. 托利(Michael C. Tolley)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约翰·查勒(John Zaller)。特别感谢约翰·查勒、吉姆·卡尔森、乔·古德曼、多瑞斯·格莱布和大卫·琼斯(David Jones)所提出的深入见解,以及莱斯利·科纳(Leslie Connor)所做的出色审稿。

最后,还要感谢 www. InsidePolitics. org 网站、布朗大学政治学学院、约翰·哈森·怀特爵士民意调查中心(John Hazen White, Sr. Public Opinion Laboratory)、A. 艾尔弗雷德·陶曼公共政策和美国体制中心(A. Alfred Taubman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and American Institutions),以及布朗大学的本科生研究与教学辅助项目(Undergraduate Research and Teaching Assistantship program)。本书的完成离不开这些团体的支持。

达洛尔·M. 韦斯特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党派性媒体	10
报纸之争：汉密尔顿 vs. 杰弗逊	12
《处置外侨法》和《惩治煽乱法》	16
杰弗逊时代	18
杰克逊革命	22
党派性报业的弱点	26
第三章 商业化媒体	29
技术影响新闻传播	31
独立编辑的出现	32
蓄奴制的挑战	36
南北内战	40
重建时期	44
普利策和赫斯特出现	49
1898 年西美战争	52
二十世纪初的媒体与国家建设	53
第四章 客观性媒体	55
客观性的出现	56
进步运动	59

第二次世界大战	61
战后大众教育的扩大	63
学界的评价	66
越南战争	68
水门事件	70
来源可信度的高峰	72
 第五章 解释性媒体	 74
向解释性转变	76
新闻分析的出现	77
广告监督	79
政治专家	80
威廉·肯尼迪·史密斯案	82
希尔—托马斯案听证会	85
媒体可信度受影响	89
 第六章 分化的媒体	 92
媒体市场的分化	93
默多克和特纳在媒体分化中的角色	96
全球互联网的兴起	100
同质新闻报道衰落	103
O. J. 辛普森案	106
克林顿性丑闻	109
小约翰·肯尼迪之死	114
对媒体的反感	116
 第七章 媒体的未来	 119
媒体体制力量衰落	120
媒体专业化的衰落	121

多数之中有安全 124

媒体分化的危险 128

大众媒体的未来展望 134

总结：媒体在民主政治中的关键角色 138

附 录 139

注 释 141

第一章

绪论

1998年1月17日,31岁的马特·德鲁齐(Matt Drudge)像往常一样在位于好莱坞的寓所里管理着他自己的因特网通讯。但是这一回,他却正准备发布一则桃色传闻,直接涉及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前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之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关注名人们的流言蜚语——即便有时不免是空穴来风——正是德鲁齐的擅长之道,他喜欢以此来挑战主流媒体。事实上,这已经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了。任何有着匿名消息来源的人只要通过电脑就可以将该消息发布给数以百万计的人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德鲁齐的一己之力不可小视。他同时兼任作者、编辑和事实核查者,通过自己的网站吸引着几十万的受众。¹

但德鲁齐并不是唯一投入到克林顿绯闻事件中去的人。《新闻周刊》(Newsweek)的记者迈克尔·伊斯科夫(Michael Isikoff)已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采访关键的消息来源者。他曾受雇于《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是业界颇有名望的新闻工作者。实际上,恐怕除了总统本人之外,伊斯科夫比华府的任何人都更知晓此事的内情。例如,在调查过程中,他发现克林顿与上述的年轻实习生之间的情人关系,他甚至还发现总统曾私下被控猥亵另一名白宫的实习生凯瑟琳·威利(Kathleen Willey)。

但是,相比较德鲁齐来说,伊斯科夫也有他的短处。在《新闻周刊》,各个层级的事实核查员、编辑和律师都会来过问他的报道,以确认

事实的准确性。针对这样一篇宣称现任总统有不道德行为的文章,公司的经理们更是要求对每一细节都做彻底的核查。他们可不想惹是生非。而这些风险控制手段却给这项调查带来讽刺性的结果:正是因为事实核查耽误了相当长的时间,这使得德鲁齐能够抢在《新闻周刊》之前,成为第一个将总统的这桩桃色新闻公之于众的记者。由此,德鲁齐还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其中心就在于新闻价值和新技术给新闻报道职业带来的变化。

在这之前,媒体并不总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报道政界丑闻的,其结果也大相径庭。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曾被指责与他的某位女奴生下了一个孩子。甚至连最杰出的美国建国者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也曾不得不承认其与某位有夫之妇的出轨关系。²但在上述的两个例子中,当事者的公众声誉并没有受到影响。尽管私事遭到曝光,杰弗逊和汉密尔顿都依然保持了很高的公众威信。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媒体报道都相当地偏袒这些政治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的读者普遍较为审慎地看待报纸的报道。

1884年,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格罗夫·克里夫兰(Grover Cleveland)也面临着类似的一则丑闻,他被控在1874年与一位来自水牛城(Buffalo)的寡妇玛丽·克罗夫兹·哈宾(Maria Crofts Halpin)发生了婚外关系,并生下一小孩。虽然克里夫兰保住了民主党候选人的资格,但十天之后,《水牛城晚报》(*Buffalo Evening Telegraph*)就发表了一篇题为《骇人听闻——公众人物历程的黑暗一章》的文章。针对克里夫兰曾虔诚地表示要作为一名有道之士来推进政治改革,该文详细描述了其所谓“玛丽·哈宾和州长克里夫兰之子的故事”。³

在十九世纪晚期,媒体的商业化发展、出版商的强势、扩大发行量的渴望以及耸人听闻的报道风行一时。无独有偶,水牛城的曝光事件之后,其他小报也报道了类似的新闻,并有传言说克里夫兰与“低级的妇女有染”。尽管克里夫兰负担了这个孩子在孤儿院的一切经济费用,他的对手们还是逮到了一个甚好的机会来挖苦他,他们甚至还编了一

支上口的小调：“妈妈，妈妈，爸爸在哪里？/ 爸爸在白宫 / 哈！哈！哈！”然而，如此“空前的丑闻”并没有阻挡克里夫兰成功当选美国总统。⁴ 经过一场你死我活的竞选之战，克里夫兰仅以 23 000 票的微弱优势击败了他的对手，共和党人詹姆士·布莱恩（James Blaine），成为内战之后的二十年来首位民主党总统。

在 20 世纪 60 年代，约翰·F. 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曾和不少女人有过绯闻。他甚至和情人在白宫裸泳，和办公室秘书在午间幽会。⁵ 然则所有这些事在当时都没有遭到曝光，因为媒体认为这些都只是总统个人的私事，不具备新闻报道的价值。六十年代是一个客观性媒体的年代。专业训练有素的记者努力试图克服其前辈们的偏袒性和小报化报道。公众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也被截然地区分开了。风流韵事并不理所当然地成为新闻，除非还伴有刑事指控或是该行为实在是过于不慎重。

但是到了 1987 年，媒体报道的准则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时，加里·哈特（Gary Hart）是当仁不让的民主党总统候选提名人。在 1984 年的首轮选举之后，他就被看好能够顺利当选下一届的总统。然而，那些了解哈特的记者们却很担心他的个人品质。早有传言称他是个花花公子。根据华府的小道消息，哈特与很多女人都有关系。

但是，一个新的传媒时代正在酝酿之中。记者们从对于客观性的追求逐渐转向了调查和解释性的新闻报道。为了寻找其外遇的证据，一名《迈阿密先驱报》（*Miami Herald*）的记者开始监视哈特的寓所。不久，他发现哈特与一名叫做唐娜·莱斯（Donna Rice）的年轻单身女子在此过夜。⁶ 第二天一早，当两人一同离开寓所时，该记者就上前与其对质，并随后撰文指责哈特的不当行为。在很多记者看来，哈特的行为暗示其具有更深层次的性格缺陷，例如偏好高风险而又不负责任。

与客观性媒体的时代不同，记者们不再忽视个人行为，他们围绕着不忠的男女关系问题向哈特施加压力。“这难道不是通奸么？”在一次电视直播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追问道。而哈特则拒绝就此做出任何

回答,并认为媒体无权如此提问。然而,此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由于媒体持续地质疑他个人是否适合成为政府首脑,哈特的竞选之旅也就夭折了。

在克林顿的案例中,广泛的媒体关注却带来了最意想不到的结果。⁷ 随着媒体曝光了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之间的关系,总统的任职表现评价却陡升至 67% 的支持率,民主党甚至还赢得了 1998 年的中期选举,一举打破了总统所在政党中期选举必然失利的规律。而在美国众议院因其在该丑闻事件中作伪证并妨碍司法公正而弹劾克林顿之后,总统表现支持率甚至进一步高达 72%。⁸

而这场争议之中最令人惊奇的却是大众媒体自身成了最终的失败方。普通民众并没有责怪克林顿因其不良行为而招致了新闻报道的讨伐,倒是认为媒体应该对一些令人反感问题的发展承担责任。在民众看来,记者应该对新闻媒体的狂轰滥炸负有一定责任。电台的脱口秀主持人以及全时段新闻台以一种令人恶心的方式检视着此间的每一个具体细节。而电视和因特网则用视觉语言在公共领域内大肆谈论着诸如口交和自慰之类的话题。“媒体”在这场争议中扮演着火上浇油的角色,并抛出一些完全离谱的细节,从而遭到了公众的鄙视。

在本书中,作者将考察 1789 至 2000 年间美国新闻媒体制度作为一种主要政治力量的兴衰历程。在梳理了两个世纪以来各种对于美国政治家——从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到比尔·克林顿——的报道之后,作者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记者报道事件的方式以及媒体所具备的影响力有着规律性的差异。例如,在十九世纪,记者们并没有太大的权力。由于他们早期往往不是一味攀附于某个政党,就是兜售商业化的小报,记者的威信也极低,并且对于出版商和公众的影响甚微。因此,当媒体指责杰弗逊、汉密尔顿和克里夫兰这些名望之士的私事时,人们不会轻易地相信报道,名人的威望也鲜有损失。

直到二十世纪,记者们改变了报道的风格并获得了公众的信任,这才使得他们的报道成为公共生活中一个独立的声音。在美国新闻业的黄金时代,新闻记者得到了大众的尊敬,其专业性也得到了肯定。由于

其对于新闻采写几乎完全垄断,记者们成了主要的权力代言人,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国家的议程和政治生活。

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媒体的结构性变化和某种令公众厌恶的报道风格使得主流媒体的政治权力日渐衰落。随着各种新媒体途径的出现——例如有线电视、热线电台和因特网,新闻报道不再如以前那般具有专业水准和同一化了。任何人都可以报道新闻,而不仅仅是专业的新闻机构所雇佣的那些经过培训的记者。此时,对于总统的丑闻报道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影响,公众已经不再信任媒体的消息了。这样,我们就从一个媒体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时代进入到了一个记者不再受公众信赖且不再具有独立影响的时代。本书的目的就在于说明这些不同的阶段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这段历史发展对于今天的媒体意味着什么,以及这些变化怎样影响了我们的社会、文化和政府体系。

为了展开本书的论点,作者将采用一种历史的角度进行比较案例研究,分析有关二十多例争论事件的媒体报道。例如,为了考察建国初期新闻记者的作用,作者就留意到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与托马斯·杰弗逊之间的激烈争斗、《处置外侨法》与《惩治叛乱法》、杰弗逊时代以及杰克逊革命。在其后的十九世纪,作者的注意力就集中到了技术的兴起、独立编辑的强大角色——如詹姆斯·戈登·本内特(James Gordon Bennett)、霍拉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亨利·贾维斯·雷蒙德(Henry Jarvis Raymond)、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以及分析具体有关奴隶制、美国内战、重建年代和美西战争的媒体报道案例。关于二十世纪,作者的研究案例报道包括:美国进步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哈特的选举运动、威廉·肯尼迪·史密斯(William Kennedy Smith)的强奸案、克莱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的最高法院听证会、O. J. 辛普森(O. J. Simpson)的谋杀案、克林顿—莱温斯基丑闻以及小约翰·F. 肯尼迪(John F. Kennedy, Jr.)的飞机失事和遇难。

通过分析和评论上述及其它的案例,作者的目的在于从中总结出媒体作用和公众反应的方式,以及每个时代的媒体报道所反映的媒体

自身情况。两个世纪以来的媒体报道和组织可以让我们分析研究媒体的长期变化,从而理解其演化发展的缘由。在每个历史时期,新闻采写都给当时的政治体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每个时期也都有各自不同的新闻采写方法、不同的新闻定义、摆在政府官员面前的不同困境,以及公众对于媒体的不同看法和反应。媒体体系的变化中也蕴含着以下各因素之间的复杂交合:新技术手段(例如1844年出现的电报、1876年出现的电话、铁路网的扩大、20世纪20年代广播电台的兴起、1946年诞生的海岸间电视广播,以及1991年登上历史舞台的万维网),政治家、出版商、编辑和记者改变媒体组织的个人能力,还有更广范围内的各种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例如教育、职业化、战争和市场竞争,正是这些因素塑造了媒体组织得以发挥作用的背景。

作者通过不同类型的材料来分析具体的媒体体系是如何运作的。例如,他研究了媒体备忘录,并从中了解编辑和记者们的激励机制。他搜集了有关媒体体系的历史材料和具有争议性的事件,从中剖析各个时期对于媒体角色的描述。他利用有关技术创新传播、教育水平变化、职业化进程、战争和市场竞争等方面的数据,分析其各自对于新闻报道的影响。他还查阅了民意调查的数据、尼尔森评级、回忆录和历史叙述,衡量每个时期的公众对于媒体的反应。此外,他还利用原始的报纸、电视和因特网报道材料来说明新闻报道的风格变化。

回顾媒体发展的历史进程,作者总结出了五个大体的阶段:党派性媒体(18世纪90年代—19世纪40年代)、商业化媒体(19世纪40年代—20世纪20年代)、客观性媒体(20世纪20年代—70年代)、解释性媒体(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分化的媒体(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里的年代划分仅仅是大体而言,并不如政府换届时间表那样精确。相对于由大选和重大事件(如美国内战、大萧条等)所标志的各政党执政时期来说,媒体演变的阶段显得更为混乱也更缓慢。各个媒体时代并没有非常精确的定义,也没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日期。这些阶段所代表的往往是不同类型的报道组合。例如,在客观媒体时代也可以见到小报报道,而在如今的分化媒体时代也并不是没有党派性的报道。

然而,尽管有这些例外情况,从媒体历史发展的大局上讲,我们还是能够发现一些可以观察到的模式,正是这些模式帮助我们理解媒体的长期转变及其带来的潜在动力。

本书的结构就是围绕上述的五个阶段来组织的,并在各个阶段中包含了相关的案例研究和具体资料。第二章论述了第一个历史阶段,即“党派性媒体”。该阶段包括了美国建国初期的几十年间。作者指出,此时期的新闻记者并没有独立的影响力。各大主要的报社都由政党赞助,并被认为是各党派拉拢选民的工具。报纸有着鲜明的党派观点,为实现党派目标服务。各种政治性的报道试图动员各政党的支持者,而记者往往只是向各别党派献媚罢了。这些情况都可以从关于主要争议性事件的报道中一窥究竟,例如汉密尔顿和杰弗逊之间的争斗。

在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间,媒体的权力得到了稍许的增长,进入了“商业化媒体”阶段(见第三章)。随着廉价报刊的蔓延、电报的诞生(1844年)、铁路网络的扩张以及美国的工业化,媒体变得更具有商业导向和小报化了。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美国的第一家新闻社,即美联社,它拓展了新闻的受众面。同时,若干家全国性的日报也在这时蓬勃发展,推动了美国国家意识的成型。为了说明这些变化,作者将分析技术对于新闻传输的影响、大出版商和编辑的崛起,以及其他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事件,例如奴隶制、内战和重建。

在第四章中,作者将探讨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之间这段时期。在这个阶段,媒体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的主体,被称为“客观性媒体”。就像法律、医学、商业和教育界一样,此时的媒体行业进入了专业化发展的轨道。新出现的新闻学院努力培养记者的专业化标准,如公平、客观,以及如何避免明显的党派偏见。新闻部门也被从评论部门分离了出来。报纸的评论仅限于评论版面,而不能刊于头版。记者的目标就是发现事实,并且根据明确而客观的标准来评价政府的表现。虽然没有人能够声称记者们达到了这些远大的目标,但这种向客观性的努力和报道的总体专业化提高了新闻工作者的公信力,并为他们在美国公众中赢得了罕见的尊敬。